

中国 文化 史 丛 书

ZHONGGUO WENHUASHI CONGSHU

中外比较教育史

(加)许美德 (法)巴斯蒂等著



周谷城主编

中国 文化 史 丛 书

ZHONGGUO WENHUASHI CONGSHU

# 中外比较教育史

(加)许美德 (法)巴斯蒂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丛书常务编辑 王有为  
丛书封面装帧 范一辛  
邹纪华  
本书责任编辑 朱子恩

中国文化史丛书

周谷城 主编

中外比较教育史

(加)许美德 (法)巴斯蒂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75 插页 1 字数 314,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内精装本500本)

ISBN 7-208-00507-9/K·125

定价: 平装本 11.25元 精装本 15.65元

# 《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谷城

**编 委** (依姓氏笔画为序)

王 尧	叶亚廉	刘再复	刘志琴
刘泽华	朱维铮*	纪树立	李学勤
李致忠	张 磊	张广达	金冲及
金维诺	庞 朴*	姜义华	陶 阳

〔有•号者为编委会常务联系人〕



## 编者献辞

以悠久、丰富、灿烂见称于世的中国文化，哺育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华民族。

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文化，为人类的进步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珍藏。

今天，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正在大踏步地迈向新的纪元；世界上过度物质化了的国家，重新又把它们的目光投向文明的古邦。

于是，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论它的千秋功过，规划它的锦绣前程，便织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这套丛书，因此诞生了！

我们设想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诸如区域文化，民族文化，考古学文化，科学工艺，生活起居，思想学说，语言文字，艺术文学，体育武术，宗教神话，文化制度，文化事业，文化运动，文化交流与比较等等。

当然还需要综合性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我们期待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通史著作问世。在这以前，以体现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特色为宗旨的一系列著作，也将列入我们的丛书。

既称丛书,又受作者、编者和出版者各种条件的限制,内容自然难免不齐。我们企求在不齐中略见一致,所以争取在五年内先刊行五十种,以期初见系统性。但愿我们的初衷,十年刊行一百种,能够实现,那时读者也许会觉得这套丛书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了。

任何关于编好出好这套丛书的建议和批评,我们都竭诚欢迎。

**中国文化史丛书编委会**

**1984年10月**

## 中文版前言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书,原名《中国的教育和工业化的世界:文化传递研究》(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经原书主编同意,中文版更名《中外比较教育史》,列作本丛书的一种。

这部书是学者们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一项成果。原书主编之一R.海霍(许美德)为英文版撰写的序言,描述了它的诞生过程。从中可知,本书各章的特约撰稿人,都是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的成员,都对近现代中国教育史研究有素。而且,由原书主编提供的特约撰稿人介绍,还可得知他们多半都有在中国生活过和工作过的经历,其中包括一位中国学者。

因此,他们就同一主题,“研究实践上的和理性上的中国教育与工业化西方、苏联以及日本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视角对这种关系的过去和现在进行历史分析,旨在阐释作为一种文化表现的教育,从工业化世界移转到发展中世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无论其理论和方法的可接受性如何,都将对于中国读者有所裨益。

本书所讨论的教育,无疑属于泛文化概念,因为书中还有专门阐述医疗卫生和宗教传播的章节。但本书作者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步入近代化的历史。尽管本书没有

描述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体制——官方的太学和半官方的书院，如何同外来的高等教育体制即西方大专学校制度发生冲突的专章，然而它的讨论从十六世纪末欧洲传教士入华开始，便已显示这种冲突的焦点所在。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近年来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的视线。本书的编作者也不例外。英文版提要强调，“本书尝试用这种理论，即教育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世界，都已被应用稳定政治秩序和从事经济开发”，而经济开发的例证便能“由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的详细的和富有刺激性的历史分析所提供”，就是编作者意向的自白。

这一意向引起我们的兴味，原因倒不在于自白本身，而在于编作者以教育为例所探究的“文化传递”现象。

作为一种文化表现的教育，它的社会功能是将儿童引入成人社会。这种纵向的文化传递，即文化传统的代代相传，是任何教育史研究者都不会忽视的。然而人们却经常忽视横向的文化传递，即外来的文化传统与本土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交融等问题。对于文化传递研究来说，这种忽视可能导致的影响，正如忽视在江湖中间筑坝截流可能造成生态平衡失控的效应一样。

“他山之玉，可以攻错。”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教育步入近现代过程中间文化传递现象的研究，即使结论未必悦耳，乃至未必正确，例如本书若干章节显示的撰稿人对中国历史颇为隔膜那样，但对于正在为教育现代化劳神焦思的中国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启迪，不是吗？

至于本书中文版的由来，也需略作交代。

还在1986年春末，R·海霍博士应邀再度来华，从事中国高



等教育改革及其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因此，我有机会面聆海霍博士关于本书设计和进展的介绍。我立即想到这个课题正是《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项空白，便采取“特事特办”的态度，先同海霍博士达成出中文版的君子协定，再相继向庞朴教授和主编周谷城教授通报，大有先斩后奏的嫌疑。海霍博士恪守信用，随即通知已取得另一主编巴斯蒂教授的同意，给我寄来本书英法文本的原稿的全部复制件，并惠予我进行必要删节的授权。

这就使我可以组织中文版的编译事宜。按照规定，中文版应与英文版同步发行。中文版的编译，于1987年2月大体完成，没想到同年4月英文版已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发行，而中文版仍在襁褓中。那原因颇复杂，兹不赘述。总之推迟到现在才发稿。同英文版相形，中文版作了个别字句的删节。删节的原因，在于这少许字句，对于外国读者可能是必要的，对于中国读者则属于是多余的。至于某些章节段落，虽然陈述的见解是我不敢苟同的，但一经删节便致伤筋动骨，因此我也不敢轻易动笔。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应该遵循党的双百方针，在学术上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无论这不同意见来自何方。逆耳的话未必是忠言，但忠言逆耳，正如良药苦口一样，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箴言。教育不仅属于传统，更属于未来。涉及我们民族未来的任何问题，充分的讨论都是必要的，尽管讨论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陈腐的见解。好在我们的改革与开放已有十年，读者对于外来思潮的鉴别能力，已提高到足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

由于本书的学术性很强，参与翻译各章的译者，都是年轻学者。他们的专业水准和中文表达能力都可信赖，但对外文的理解深度，则可能有参差。全部译稿都经我作过文字加工，因此中文

版可能出现的理解问题，都应由我负责。译者姓名均在目录页和各章篇末标出。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参与中文版全稿通校的还有两位年轻学者，李天纲和陆永玲，他们付出的辛劳，应予附笔致谢。

**朱维铮** 1987年11月

## 英文版序言

1984年7月,世界比较教育学会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集中在教育中的自主性和依赖性的主题上。第一次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学者参加这样的会议,在本次会议的那一星期里,中国比较教育学会被接受为本学科世界学会的完全成员学会。

对我们这些一直从事近代和当代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最大意义的事件。我们终于能与中国同行们在一个学术场合坐下来,讨论中国教育发展中的经验。作为本次大会的一部分,我被邀请来组织一个以中外教育关系为主题的讨论会。当玛丽安·巴斯蒂以年长学者的身份应允担任这一讨论会的顾问时,我真是高兴。她多年来对从晚清到现代的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进展提供了基础。

讨论会本身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事情。习明纳尔会议室的环境优美,窗前能俯瞰巴黎万神殿广场。讨论会结束以后,我们决定不出版会议论文集,而赞成另一个出版计划:即以一个包容更广、体系更严整的方式写作一部以中国的教育与工业化世界为专题的著作。自主性和依赖性的大会议题引用了自主性理论提出的概念和问题。受此指点,我们决定通过对中国与日本、苏联以及西方工业化列强之间的历史经验的仔细观察,来测验一下

那已提出的教育传输常常被用来巩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的观点。进一步地说，我们感到需对因当前中国向外界教育观念和模式开放而引起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作两者平衡的理解。就此一点，对中国历史经验作一个彻底的剖析式的阐释是重要的。因此，本书专门以三章的篇幅来谈中国当代教育政策和实践。最后，我们认为没有对中国教育观念和模式也曾对工业化国家产生作用这一事实的认识，这一形态的研究就不能说是完成。然而，本书的规模未允许我们把这个题目做得象它本身所包含的那样全面。我们很高兴能够安排两章内容，来描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关于儒家教育的观点，以及本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对毛主义教育思想的狂热追随。

我本想评论一下每一特约撰稿人给他(她)们的章节带来的特殊风格。但是，我还是把这留给读者去发现，他(她)们中许多人的名字已在中国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圈子中为人熟知，其他一些年青的学者正开始建立他们的标志。他们全都把本书的总体理论与各自的分析联系起来，形成了合作，在进行修改和校正时，他们被要求做到这一点。在为一个题目所进行的共同合作中，我获得了远比任何一个单独从事研究的研究者大得多的愉快，为此我要感谢每一位作者。此外，我还必须感谢宋一林(音)为我准备了中文术语的词汇表。感谢安大略教育研究所(DISE)出版社的夏龙·理查蒙德(Sharon Richmond)和谢拉·巴那德(Sheila Barnard)，他们为最后一稿的所有方面作了专业技术指导。并感谢夏普(M. E Sharpe)出版社的编辑道格拉斯·墨文(Douglas Merwin)，在此题目上的鼓励和合作。我个人必须对把第一、二、五和十一章从法文译成英文负责。我还须对我

---

所作的中国教育及其国际关系的书目选录负责，我希望它将成为一个有用的研究工具。

**露丝·海霍(许美德)**

# 目 录

- 中文版前言**.....朱维铮 (1)
- 英文版序言**.....露丝·海霍(许美德) (1)
- 1. 是奴役还是解放?**  
——记1840年以来外国教育实践及制度引入中国的进程  
.....(法)巴斯蒂著 周锦礞译 朱静校(1)
- 2. 欧洲人眼中的儒学教育**  
.....(法)伊莎白尔·拉瑟拉著 黄慰堂译 王英校 (27)
- 3. 帝国主义和自由思想的传播**  
——英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英)迪莉亚·达文著 李天纲译 (48)
- 4. 向日本借鉴：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教育体制**  
.....(日)阿部洋著 金光耀译 (90)
- 5. 作为文化合作关键的技术教育：中德的经验**  
.....(联邦德国)弗朗柯伊斯·克莱斯勒著 王立诚译(120)
- 6. 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法国同中国教育交流的二律背反** .....(加)露丝·海霍(许美德)著 王立诚译(145)
- 7. 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  
.....(美)休伯特·O·布朗著 王立诚译 (183)

8. 壮大我们的队伍:加拿大医疗传教士在四川  
 .....(加)文佳兰著 魏葆霖译(216)
9. 是聚合还是翻版:中国和苏联  
 .....(澳)毕荣宁著 高晞译 王立诚校(250)
10. 苏联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美)李欣良著 王立诚译(294)
11. 近年法国教育思想和西欧实践中的毛泽东主义  
 .....(法)罗兰著 陆永玲译 林太校(316)
12. 中国与工业化世界在现代教育上的关系  
 .....(中)黄仕琦著 周锦礞译(360)
13. 教育现代化——探索更高的效率  
 .....(荷)韩友耿著 杨焕明译(398)
14. 中国和工业化世界之间教育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加)露丝·海霍(许美德)著 俞理明译(423)
- 附: 特约撰稿人介绍..... (453)

# 1. 是奴役还是解放？

## ——记1840年以来外国教育实践及制度引入中国的进程

巴斯蒂

### 导言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这些警句引自五经中的《礼记》<sup>①</sup>，它们强调了教育的基本职责。自古以来中国人总是在使教育与国家保持一致，也总是将教育归并至政治、社会的那套概念之中。不管它旨在培养道德，还是意欲造就领导之材，它都具备国家的职能。人们用它来确保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因为有此作用，人们就承认它是一种国家的职能，尽管各种非政府的机构及个人也参与实际事务，但这种国家的职能却始终将国家的最高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

国家的这种特点以及这些有关教育作用的传统思想，在中国教育对外交流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它表明中国人对引进外国的信条及实践在政治、社会上所要冒的风险早就有所意识，也表明教育上的引进成败与否，与中国政府对它们的改造情况休



戚相关。

我在此仅对外国教育思想渗入中国的各个不同阶段作一描述，力求找出每个阶段的特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论及当前中国教育制度对外开放、交流的情况时，能有所启发。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起，可分四个时期。起先，中国人把外国教育看成是纯属专门范围里的新知识的载体。然后，从 1890 年代到 1925 年，他们采用某种兼具解放及统一作用的外国教育模式。从 1925 年到 1949 年，则是一个折衷地对待教育借鉴的时期。自 1949 年至今，他们对过去岁月的教育引进，进行了谴责及一系列的否定，与此同时，国内外情势的发展也使旧的模式事过境迁，影响、意义不复当年。

### 作为新知识载体的外国教育

欧洲教育实践的情况起初是由耶稣会修士在十七、十八世纪传至中国的。耶稣会的神父们尽管用科学技术上的专长为皇帝服务，却并未在中国建立任何教育机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用他们的专门知识来结交中国的士大夫，但此举并不是出自正式的指示。他们在钦天监任职，协助其同僚工作，却甚至连一所培训科学人材的学校也未建立。中国当地教士的培训，是在国外的神学院里进行的。从 1581 年至十八世纪中叶，被授予神职的只有 45 人。<sup>②</sup> 耶稣会修士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教育原则的创新上，实际上也没有专注于推理的方式，他们只是简单地传授知识的内容。明末的中国士大夫不管这种知识是道德、哲学的，还是科学、技术的，都将其看得浑如一物，几乎都对其交口赞扬，称它为“天学”、“西学”。<sup>③</sup> 但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已普遍地将传教